主编/潘洪其
编辑/王晓东
美编/沙楠
责校/李克明

以三大支柱加码民生改善

本报特约评论员

今日社评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天召开，今年全国两会由此进入高潮。出席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比往年更加关注民生改善，会前媒体对今年两会民生热点、焦点话题的预测，与代表、委员的实际关注高度契合，而会内外舆论对今年经济增速的关注度，似乎比去年进一步淡化和淡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左右，下午由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主答的新闻发布会上，如何实现“保七”的目标，依然是与会媒体记者高度关切的核心话题。

尽管实现了“保七”未必就能同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但若未能实现“保七”，多数民众定会直接感受到欠幸福。提高收入、社保医保、教育培训、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除去政府的决心及执政理念更新，都离不开增加公共预算投入，其重要的前置条件是，政府要有更多的钱可用。政府的钱主要来自税收，只有确保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政府用于民生改善的公共投入才能水涨船高。明乎此，以“保七”为基点，今年加码民生改善，有赖于三大支柱的有力支撑。

提高收入、社保医保、教育培训、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除去政府的决心及执政理念更新，都离不开增加公共预算投入，其重要的前置条件是，政府要有更多的钱可用。

第一是底线支柱。增加民众收入、调整存量结构、纠正分配不合理状态是个慢活，增加收入今年仍须做足“增量文章”，而扩大就业又恰系最可靠、最能立竿见影的抓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新增就业1000万人，要实现此目标，按现阶段经济结构，GDP每新增1%，大体可新创就业岗位160万个，拿此数据乘以七，倘若今年经济增幅真能实现“保七”，大体可新创就业岗位1120万个，就算这个就业目标能如愿实现，那也是颇有些“惊险”的紧平衡。所以，力争实现7%左右的增长目标绝非可有可无，而是确保有效就业也即增加民众收入的底线目标。

第二是投资支柱。去年4月份后，中国事实上已经持续施行经济刺激措施。尽管此轮投资刺激不像2009年那样启动“大水漫灌”，而是专注于“精灌”和“滴灌”，但诚如徐绍史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言，仅中央政府层级，就已陆续推出七个系统性工程建设“投资包”以及六个民生改善“投资包”。坦率讲，假如去年从二季度起未能及时推出上述十三个大型“投资包”，全年7.4%的经济增幅肯定会泡汤。

需要正视的是，去年十三个大型“投资包”吸纳社会资本尤其是私营资本的效果明显欠佳。这一方面是因为赢利预期明确的好项目偏少，令大量社会资本因担心“被套”而继续观望，不敢轻易接盘；另一方面，扩大投资的配套政策尤其是在税收、信贷贴息、土地供给等关键环节，“部委梗阻”（譬如用地指标）、“中梗阻”（包括地方梗阻和地方部门梗阻）、“下梗阻”（实际办事人员的梗阻）依然普遍存在，而且越往下越甚。政府及各类国企大多舍不得拿出好项目来与社会资本分享，最令社会资本感叹纠结。

第三是低成本创业创新支柱。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徐绍史的答记者问，都用大篇幅强调政府大力支持创业创新，而在具体落实层面，创业创新者仍感到，政府承诺与落实之间存在诸多有形无形的沟坎。比如，降准、降息所释放的流动性及融资成本下降的利好，仍有相当部分未能用在具体的创业创新项目上。再如政府减税、定向扶持所形成的实质性利好，也未能首先满足创业创新的急需，导致大量政策资源未能用对地方，造成令人痛心的“转移式消耗”。支持创业创新，把政策资源用好，为“保七”提供足量的增量产出，使其明显抵消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带来的经济减量，政府要深化自身改革，通过改革下真功夫、长真本事。

加码民生改善力度，回应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破解的难题远非上文所及，但首先致力于“保七”，率先破解以上三大障碍显得尤为重要。

两会快评

新提法蕴含理政新变化

朱昌俊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有不少新提法，如“有权不可任性”、“创客”、“责任清单”、“互联网+”等均是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中央政府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和新一年施政部署的纲领性文件，历来是两会新闻的重点关注对象。其中的新提法，看似只是一个词的变化，但却往往蕴藏着新一年的政府施政动向，成为观察未来一年政府理政的一个重要窗口。

也正因为其所具有的特别意义，盘点两会报告中的新提法，几乎成为媒体两会期间的惯例操作。较之于去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科技创新、产权保护上的新表述，今年两会“新词”一个重要特点即是表现出较强的民间色彩，接地气。如“有权不可任性”、“创客”、“农药兽药残留”等。

严肃的政府报告运用已经耳熟能详的流行词，往往能够拉近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也让人间接感受到政府施政与民众关切之间所保持的近距离。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表达行为的创新本身，其真实所指才是真正用意所在。如“有权不可任性”，出现在“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的语境中，其所对应的正是简政放权过程中出现的放权不彻底和截留行为，指向的是懒政怠政的不作为现象。此外，“为官不为”也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由此，或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对于为官不为等懒政现象的治理将与反腐并行，成为一种治理新常态。

再如“创客”一词，事实上在政府工作报告披露之前就已经火起来了。这是因为在今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李克强就在深圳考察了柴火创客空间。而对于创客的关注，更与这届政府对于创业的重视密不可分。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提出，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双引擎”，或可说明今年政府将在创业环境的优化上出台更多的有力措施。

对于民生的关注，历来是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一笔。这次报告涌现的“农药兽药残留”、“书香社会”、“智慧城市”，都与此相关。与之对应的正是食品安全、文化软实力构建与健康的城市化建设。其中打造“书香社会”，总理过去一年的施政行为中已经有所体现，如在去年世界读书日前夕，李克强致信三联书店：引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至于“智慧城市”，又与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总理对于新型城镇化的生动阐述“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形成呼应。

于一个快速迈入互联网2.0时代的社会，政府工作报告当然不会回避对于互联网的关注。总理个人在多个场合与互联网大佬们的对话，以及此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都表明政府在拥抱互联网上的开放态度。而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信息安全，既是强调对于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也表达了对于互联网时代信息安全的重视。这些在未来都可能转化为具体的政策。

当然，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提法蕴含了新的信息增量，但消失的表述，同样有着其特定意义。比如今年在谈及计生政策时，报告只提及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而并未延续往年“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的表述，就被外界解读为可能表明政府在计生政策调整上的谨慎和态度微妙改变。

两会报告的变与未变，新提法与旧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风向标意义。其信息量越大、变迁越大，越预示着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在加大，政府的施政与现实变化的契合度在增强。在这个意义上，新提法所蕴含的意义和信号或无须刻意拔高，但值得观察与重视。

本版邮箱
meiripinglun@vip.sina.com

非常视点

从热解报告看合力汇聚

燕农

3月5日，微博再一次被刷屏，主题是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刷屏者不只有媒体官微，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只有各路精英网络大V，还有无以统计的普通网民。刷屏内容不只有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摘选，更有不同角度的解读与“解码”。截至下午4时，新浪微博上“政府工作报告”话题讨论量达到17.3万条，阅读量达到1.2亿次。

海量关注与热解喷发而出，固然表现为网络信息平台和自媒体的勃兴热潮，但根本上是网民们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关注热度大为提升。媒体官微之所以频频推送，归根结底还在于网民们有阅读需要。而且，热度并不止于阅读，更有网友梳理出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预期目标与最终实现结果的对比，分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各种新提法，以及微观研判今年各领域或将呈现的新变化。

暂且不论种种民间解读是否准确，这种“围观”政府工作报告的热度就让人振奋不已。曾几何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只是代表、委员的事，而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主力则是专家学者，普通民众似乎离两会“很远”。然而，两会是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议政场，上一年的工作预期目标完成了多少，新的一年有哪些新举措，关乎每个人的福祉安康。当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工作报告生发兴趣，表明公民意识与公民素养在上升。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东方眼》节目中所说的：好多人不太重视政府工作报告，觉得版面那么多，看起来要花好长时间，你一定要看，它跟你有关，你要看看政府今年做的事情，哪些是你满意的，哪些是你不满意的，你希望明年做什么，借这个机会其实都可以表达出来，通过自己的自媒体、微博、微信都可以表达出来。可喜的是，今年网民们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关注与解读是那么活跃。

是的，每个人都跟政府工作报告相关。你或许不通时事，但从自身权益出发，懂得取消居住证收费放宽户口迁移、全面实行居民阶梯价格制度等等新政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你或许对宏大议题无从把握，但对财政用于民生的比例达到了70%以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超过了GDP的增幅等等这些有切身感受……一言以蔽之，在长达1万多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或许每个人都能找到多个契合点。

虽是“困难和挑战比预想的大”，但一系列超额完成的指标令人振奋；虽是“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但各种预期目标仍让人渴望。改善民生福祉，是民众关注政府工作报告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唯有关注，才能聚拢；唯有聚拢，才有共识；唯有共识，才有合力；唯有合力，才有希望。所以，从铺天盖地的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中，我们看到的是民众心系家国，是对改革与发展的期待，是公民素养与国民责任，而这，终将汇聚成国民合力与深改动力。

焦点放谈

治理庸官懒政里的“至简大道”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的报告催人振奋，媒体盘点发现，在此次报告中出现了不少“首提”。譬如首提“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并举”以及治“庸官懒政”。报告指出，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工作不力，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庸官懒政”就是一种腐败

王聃

尽管“为官不为”是近20年来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但李克强总理谈“庸官懒政”却绝非第一次。最近的是在2月26日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就曾表示要严肃问责懒政、怠政。从总理的会议表态，到政府工作报告的郑重提出，这是看得见的趋势：治理“庸官懒政”，至少已从“强调”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意识。

何为“庸官懒政”？它并非简单的不作为，或者是官员对自身职责的轻浮执行。有研究者曾经总结出，所谓的“庸官懒政”，在现实行政生态中，其实至少存在五种表现形式：一为缺乏责任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二为缺乏公仆心，唯利是图，吃拿卡要；三为缺乏创新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四为缺乏持久力，船到码头车到站；五为缺乏真本事，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换言之，只要官员缺乏治理的能力，不依责而行，缺乏创新和持续工作的激情，都可归于“庸官懒政”。

恰缘于此，绝不能低估“庸官懒政”对行政生活的负效应，更不可将庸官和清官简单地画上等号。“庸官懒政”事实上就是一种腐败，这是必须被放大和重建的治理观念。《人民日报》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就指出，庸官造成的社会危害不亚于贪官。理由何在？不过是因为，权责对等、权责清晰就是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根本要求。干部就要干事，忠于职守、勤政为民向来是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逆如此基本要求而行，纵然没有直接的违法犯罪行为，亦是一种“亚腐败”。

“亚腐败”不能被容忍，更不能容忍的是另一种“庸官懒政”：高压治理下的“为官不为”，宁愿不作为，也不让自己犯错误被处理。所以更大的反问是：“庸官懒政”因何而持续存在？事实上，2014年起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该现象都开展了不同层次的整治活动，多地还在省级层面下发了专门针对懒政、官员不作为的治理文件。但治理的结果依旧不容乐观。原因无它，一则，当下对于“庸懒”的治理还缺乏“标准”；二则，治理尚未上升到刚性的制度乃至法规层面。

读报告然后知风向之变。在此前持续的“打虎拍蝇”式反腐之后，将治理“庸官懒政”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无疑是一种对于深度治理的持续推进。首提治理庸官懒政诠释的正是某种“至简大道”：有权也不能任性，现代国家里，权力的本质就是服务于公民和纳税人。否则，一切当被视为腐败乃至是犯罪。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治理庸官懒政，当下的紧迫任务是迅速找到一种对于庸官的切实治理方式，从行政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多个方面，来形成对于庸官的追责和淘汰环境。

治理庸官懒政关键在制度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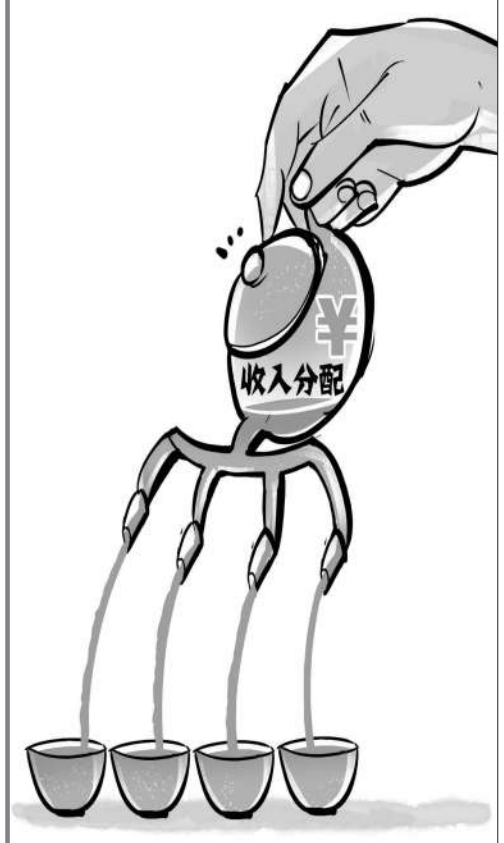
黄春景

将治理庸官懒政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决心。任由“庸官懒政”肆意蔓延，比贪污腐败还要可怕，一来影响改革效率，二来降低政府公信力。如果说“反腐风暴”矛头指向官员“胡乱作为”，那么治理“庸官懒政”则是对官员“不作为”的釜底抽薪。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让那些尸位素餐的人下来，有能力做实事的人上去。

俗话说：“治重症下猛药，打蛇打七寸。”治理庸官懒政，有什么“狠招”和“猛药”，可以促其“药到病除”呢？

首先要从健全问责制度上入手，让庸官、懒官得到应有惩罚。一句话，让干部不敢庸，效能问责不能少。根据中央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可以考虑把惩处和防范的相关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将庸官懒官纳入问责范畴，使“太平官”们不能再安享太平，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不再有生存的空间。一旦健全完善问责机制，将问责与干部的经济收入及政治待遇等进行挂钩，“庸官懒政”这一顽疾定能有效治愈。

其次要从引入竞争机制上入手，让庸官、懒官在岗位上如履薄冰。如果建立起“无为就无位，无为就是失职，无为就要腾位让能”的竞争机制，必能激活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多时候，庸官懒政现象滋长蔓延，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的设置存在缺陷。如果干部“仕而不优”、“仕而不勤”，并敢于淘汰这些“花瓶”干部，还会存在庸官懒政现象吗？问题在于，时下一些干部考核往往流于形式，为“庸官懒政”创造了条件。只要建立健全一个能让干部有压力感、有敬畏心、有危机感的竞争机制，庸官则不能庸，懒官则没机会懒。

第三要从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入手，让庸官、懒官时刻处于聚光灯下。领导干部庸不庸、懒不懒，百姓心里最清楚，所以治理“庸官懒政”，社会公众必须行使监督权。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评论员”的网络时代，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举报和监督作用，将“庸官懒政”现象公之于众，让“庸官懒政”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果治理庸官懒政也像查处贪污腐败一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必能起到很好的震慑效果和促进作用。

记得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说过这样一句话：“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诚哉斯言！“庸官懒政”已成为阻碍干事创业的毒瘤，治理“庸官懒政”已是刻不容缓。不管庸官懒政有着多么复杂的成因，眼下整肃庸官懒政已提升到一个新的治理高度。在治理庸官懒政问题上，不是对干部采取简单的“上”与“下”，根本是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干部监督管理运行机制，把庸官懒政通过制度的洗涤和过滤，让那些真正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留下来实现更大作为。